



苗岭集

蹇先艾

1981
行



苗嶺集

卷之三

苗 岭 集

麦先艾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苗 岭 集

著作者 塞 先 艾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

大众文化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 毫 1/32 印张：4 字数：72,000

1960 年 4 月第 1 版

196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统一书号：10078·1482

定价：（八）0.34 元

内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共包括十九个短篇，绝大部分都是反映少数民族地区解放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所起的巨大变化。其中《重安江边》《在漫远的日子》《青年侗族歌手》等篇描写少数民族因成立自治州而流露的喜悦和激动的心情。《忆再助松林乡》《青岩乡的一天》描写的是贵州高原农村面貌的变化。《苗岭枯树喜逢春》《芳华幼儿园》描写老年人和儿童在公社化以后的幸福生活。其余各篇，有描写生产能手在工农业战线上的冲天干劲的，也有对已故文学家的悼念。

目 次

忆再訪松林乡	1
重安江边	12
在镇远的日子	16
游飞云岩	21
青年侗族歌手	24
一天的日記	29
青岩乡的一天	33
愉快的晚会	38
开端	46
农民詩人朱昭仲	51
喜报到农村	57
两个突击队长	62
难忘的会晤	67
苗岭枯树喜逢春	79
茅黃幼儿园	85
山城贵阳的今昔	95
致保卫总路綫的战士——刘紹洲同志	100

鼓舞·感激·追忆	107
悼念王統照先生	113
后記	120

忆再訪松林乡

还是一九五五年初冬的事。

突然襲来的寒流已經过去了，又是和暖的、小阳春的天气。灿烂夺目的阳光普照着大地，一望无垠的藍空鋪着白雪似的云絮，一只矯健的老鷹在云端打圍，发出了尖厉的、惊耳的长唳。山坡上到处都兀立着參差不齐的光裸的树木，只有耐寒的松、柏、棕櫚和竹林还保持着它們濃淡不同的綠色。在高低不平的田野里，却伸展开了一大片一大片的葱翠，显示出小麦、油菜和胡豆的丰饒。

就是这样一个晴美的早晨，我同区委书记郑习庭去訪問松林乡。

松林乡是一个苗族和布依族聚居的山区，农民們很多年来都住在山前山后分散的茅頂竹壁的小屋里，一般劳动力很强，男女老少都能下田，姑娘們不但会作粗活，而且繡得一手好花。一到晚上，常常可以听到青年男女們嘹亮的歌声：在室內，有时用二胡伴奏；在山头和水边，男的常常熟練而灵巧地吹着木叶来向姑娘們呼喚与答和。松林乡风气朴实，农民性情活潑，到处都表現出一种閃爍着光彩的朝气。他們走社会主义的勁头也很大，尽管比中心地区稍迟

一些。以前开始宣传合作化和试办小社的时候，我在松林乡住过两个月，我很喜欢这个地方，这次还准备到那里去再住一些日子，并且帮农民们做点工作。

布依族农民出身的区委书记，是我的一个老相识，人很年轻、精明、能干，身材矮小，一张方方的、被太阳晒黑了的瘦削面孔。一顶黄卡叽布工作帽戴向脑后，紧紧地箍着他的头部，前额突露出一绺卷曲的头发，穿一身蓝布工作服，他给人们一个总的印象是：朴素、诚恳。我记得一九五四年初，县委书记领导着我们在那里开展合作化运动的时候，他还是五区区长。松林乡是推动全区农业合作化的重点。郑习庭一天到晚都在彼此距离很远的那些村子里跑来跑去，以一个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的勇敢战士的姿态，领导着农民弟兄们生产、办社，大风大雨都阻拦不了他的脚步，遏止不住他的高度的革命热情。只有开会的时候，他才回到区里来。会一开完，背起雨伞，挂着电筒，急急忙忙地又走了。这回一到县委，我就听说我们走了以后，他便担任了五区的区委书记。我相信今后在他的领导下搞工作，肯定是非常愉快的。

我们两个一面亲切地谈话，一面开始爬山。山势很陡，刺脚的小石块很多；郑习庭故意放缓了步子来等我，不时还问我：“你爬山不累吧？”“是不是歇一下再走呢？”从他的嘴里我才知道松林乡的党员已经由七个发展到五十多个，团员已由三十四个增加到一倍以上。想不到全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两年当中已经从两个办到十二个。全乡四百四十

二戶農民，有三百二十六戶都入了社。有四個互助組聯組最近就要全部入社了。一九五五年，五區儘管鬧了一點災荒，七個老社始終人多力量大，不僅战胜了旱災，多數社都增了產，個別社也保持了去年的生產水平。現在他們正在整黨，整團，搞全面規劃，馬上就要辦高級社了。

鄧習庭挺着胸脯往前跨步，他把頭一揚，咬字雖然不很清楚，但是聲音却非常堅定地說：“我們學了六中全會的決議和毛主席的指示以後，擦亮了眼睛，明確了方針、政策，今后的工作就好搞得多了；當然搞起全面規劃來，新問題、新困難還是會有，也不一定會少；只要我們耐心教育農民，根據中央的精神及時檢查工作，分析情況，對症下藥，問題並不是不能解決的，老蹇，你說對不对？”

當我們走下了一條跛陀的岩石路，跨過幾個很矮的小丘，進入大園村的時候，區委書記的眼睛很明快，用手向右邊那片油綠的山坡一指道：“你看，大園社的社員們都在坡上做活哩，沒有一個人不來，這個社的人心向來整齊！”

我抬頭望去，果然有不少的農民在那裡來來往往，上上下下，挑糞澆菜。他們有些人用手在向我們這個方向指劃着，似乎也看見了我們。有一個農民忽然放下他的糞桶，一口氣就跑下坡來了。他一直走到我們面前，我才看清楚原來是社主任顧銀山，滿面含笑，精神還是同過去一樣飽滿。他向區委書記打了一個招呼之後，就大步地走過來。我首先伸出手去，他的那只粗大的手把我緊緊地握着不放，彼此都感到一種久別重逢的親切和溫暖。他的皮膚變得更加紅

褐了，嘴上已經蓄起一點胡鬚，高興得搖晃起頭來說：

“同志，沒有想到你又回來了，怎麼一去就這樣久呀！是不是同指導員到我們社里去坐坐呢？”

我仔細地打量了一下這位一向沉着、樂觀的苗族農民，微笑着，徐徐地說：

“我看用不着了吧，在這裡遇到你就行了；我們不能耽擱你們的生產，晚上再去你們社里吧！我在此住的日子還長。今天早上，我們預備到各處看看，過兩天就下來幫你們搞生產了。”

一看見顧銀山，馬上就把我一度引到回憶里去。

一九五四年，松林鄉宣傳了過渡時期總路線，總結了生產以後，農民們的心都豁然開朗了，立刻卷進了報名入社的高潮，兩三天的工夫，就有六十多戶參加了大園社；但是不到三個月，反動富農賜金貴便千方百計地在暗中破壞兄弟民族內部的團結。有些富裕農民很快地被賜金貴拉走了，也有一部分社員被他用高價、預付工資和酒肉招待引誘去給他做活。有四十戶陸續退社，只剩下二十四戶，其中有十七戶還是缺糧的。當時不僅富農們在一旁幸災樂禍地嘲笑合作社，連有幾個互助組和個體農民把大園社都躲得遠遠的。顧銀山心裏一點也不着慌，他拍着胸膛說：“我們一定要走社會主義的大路，以往的日子，我們已經把罪受够了，我們不能再回轉去遭孽了。碰到困難低頭的，就算不得共產黨員！”開了群眾大會，公安部門把那個反動富農逮捕了。顧銀山一直堅持地同留下来的社員們把社辦下去。他們鬥爭和

苦干了两年的結果，因为收入增加，現在社員們的生活已經普遍地得到改善了。據說這次他們對冬季生產的情緒特別高，出工很勤。他們的奮鬥史，前一段是我亲眼看見的，後來的情形是鄉支部書記寫信告訴我的。

顧銀山一面吸着區委書記遞給他的那支紙烟，一面興奮地向我談起大園社一九五五年賣余糧的情況：社員有十四戶都賣了余糧，有九戶是自給戶，只有一戶缺糧二百四十五斤。

鄭习庭也搶着對我說：“大園社以前总共二十戶貧農，你是知道的，現在情況已經大變：只剩下四戶貧農，有十一戶已經上升成新下中农；有六戶上升成新上中农了。社員們都認識到自己能够有今天，與黨的英明領導和農業社的優越性是分不開的，大家都希望把社擴大起來；好辦高級社。”

“在我們社里，早就下定決心奔社會主義的那些社員，”顧銀山那雙烏黑的眼睛望着我們，很清楚地分析道，“就跟毛主席表揚的三戶河北貧農一樣，這陣大家更加堅決了；原來還有點怕人多無好湯，猪多無好糠的人，看見社里增了產，也放心落意了。象這樣，我們當社干的還發什麼愁！還不應該趕快把初級社办好，給辦高級社創造條件嗎？”

我還有點不放心地問道：“當初退社的那些農民弟兄，現在他們抱一個什麼態度呢？”

顧銀山一聽，聳了一下肩膀，几乎笑出聲來道：“哎喲！同志，你還在擔心他們嗎？我忘了給你說，問題早已解決了：其中有几戶早就回到社里來了；還有一些人，同另外一

一个互助組又办起了一个新社。一个农民，就看他的觉悟早迟，哪个还不愿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啊！”

我們和顧銀山分了手，順着蜿蜒的山徑一直走下去，不过一里路的光景，便到了那个基础比較好的紅山老社。女社主任的家就是社址，已經由土牆木窗的茅屋改建成为軒敞、高大、有玻璃窗的三間瓦屋了。雖說新居才搭起架子，蓋上了瓦，屋壁还只裝了一半；但是因此倒十分突出地显露了屋內那些新式农具（双輪双鏵犁、七寸步犁、打谷机和玉米脫粒机等）的面貌。門上还貼着崭新的五彩“工农聯盟”的門画。这个社的田土大半都環繞在社址的周圍。几个生产队正在一片碧色的田野里工作，东一群，西一群，有說有笑，起勁得很。有些农民动作娴熟地，一鋤一鋤地在薅着小麦。青年姑娘們穿着居家的便服，在半坡上輕松地一边薅麦，一边漫声唱着动人的山歌，表現出她們劳动的快乐。有些农民用很粗的杠子从荒山上抬着捶碎了的石块下来，到窑里去燒石灰（这是紅山老社的副业），一边走，一边吆喝。有些老年妇女却坐在紅山社門口的一个小小晒墳里，手搖着木制的、发着咿呀声音的棉花机，把一攢一攢帶籽的棉花塞进机器里去，很輕巧地搖出来，便成为脫了籽的，洁白的棉花。从地里摘来的棉花象云团似地堆滿了青石砌成的整个晒墳。社主任謝銀珍递了一条板凳給我們，我們就在那个晒墳上坐着談起天来。

紅山老社是一九五四年初办起来的。原来是一个以苗族农民为主的，三十四戶的农业社，三个社主任（一正两副）

全都是苗族，而且都是党员。现在这个社已经扩大为四十三户了：苗族三十户，布依族十三户，新添了一个比较能干的布依族副主任，两个民族团结得更紧密了。社员中有六个党员，七个团员。他们种的田地并不多，只有九百九十多挑田，一百八十多挑土（不包括租入部分），一九五五年增产了百分之二十六。

当地里劳动着的社员们看见了我这个老熟人的时候，仿佛发现了什么宝贝似的，一阵杂乱地高声喊叫着，都跑过来了，把我团团围住，好象怕我跑了一样，你一句，我一句地争着向我描写他们红山村一年多来的巨大变化和社里目前的兴旺情景。还有一些人包围着区委书记郑习庭，很关心地问他要什么时候才办高级社，他们都盼望着能够早一点办起来。社员们振振有词地质问道：“指导员，是不是我们的觉悟还不够呢？”

高小毕业生、面皮黝黑的苗族小会计李志东，说话带着鼻音，有点瓮声瓮气，长得更高了，挂着一把新把子的锄头，站在我面前，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记得去年他刚开始学记帐的时候，动作还有点慢腾腾地，拿起笔来，就象发“鸡爪疯”似的颤抖；这次在区里，我就听人说他到省城和县城去学习过三次，已经由外行变成内行了。

青年团员陆家珍，一个十九岁的、一向调皮的布依族小姑娘，看見我很注意那个小青年，便走过来，仰起天真烂漫的小圆脸向我说：

“同志，你不要小看我们这个小会计，他进步得好快啊！”

学习了回来，記帳都用了新式簿記，挂得清清楚楚，他又会打一手的好算盘，工分从来没有记错过；人又谦虚，小师傅已经带出了好几个大徒弟。你去问问，哪个社的会计不找他教？我们办高级社不愁没有人材了。”

她说完以后，不等我回答，抿了抿小嘴，马上提着锄头，象虾蟆似地又跳到地里去了。

一个瘦削的、脸上颧骨很大的苗族农民鲁仁孝，从青石砌成的窑门旁边大步地跨过来，用粗嗓音问我道：

“同志，你恐怕还不晓得我家失火的事情吧？”

我微微吃了一惊，急忙问他道：“鲁仁孝，我还沒有听说过！你家什么时候失火的？损失得怎么样？现在你有地方住吗？”

鲁仁孝看见我这样关心他，就源源本本地把失火的经过讲给我听。他不但一点沮丧的情绪都没有，反倒笑容可掬地说：“我虽说烧掉了一间茅草屋，好在社里今年增了产，我多分了好几挑谷子；社员们这个送我点家具，那个送我点木料，七拼八凑，政府又补助了我几十块钱，这如今反倒盖起两间瓦房来了。立房子那天，全体社员都来帮忙，也没有请木匠师傅，都是自己的人搞，四五天就在原地盖起了一座新房子。同志，我们凭良心说，这不是农业社带来的好处，是哪里得来的好处啊？”

郑书记满意地点头说：“鲁仁孝，你这个认识是完全正确的。”

鲁仁孝把两道粗黑的眉毛蹙了一下，似笑非笑地，放低

了声音說：“不過我還有點不滿意政府哩！”

我緊跟着問他：“你有什么事情不滿意呢？”

魯仁孝緩慢地用嚴肅的聲音說：“政府因為我受了災，沒有讓我賣余糧，我就是這點不滿意。你問我們社里哪家沒有賣余糧？只有我一家沒有賣，我心裡真是不好受，連睡覺都睡不好。”

謝銀珍還告訴了我一些令人喜悅的事情：松林鄉農民的孩子們大部分已經上了小學，年紀小的也進了新辦的幼兒園。有不少農民一到晚上，都爭先恐後地到民校去學習。過去社里開會，總是要到各個寨子去叫社干或者社員們，現在大家只要一吃完晚飯，很早就自動地往社里來了。縣委會發了一部收音機給紅山社，不到天黑，社員們都端了小板凳來聽廣播。有些農民吸着葉子煙，不住地點頭贊嘆，老年人的嘴上都露出了心滿意足的微笑，好象商量好了似的，一齊說道：

“這一下，我們不到北京去，也聽得見毛主席同中央首長們的講話了，日子真是越過越有意思，大家努點力，在黨的領導下，快點把生產搞好吧！”

鄭書記和我聽得很有趣，不約而同地發出了爽朗的笑聲。

我向謝銀珍問起農民中是不是也還有人對農業合作化有意見的。

這位苗家農婦飽經風霜的臉上彷彿有點激動，直率地回答道：“有，有，怎麼沒有呀！個別的上中農，儘管收

入并不少，他总觉得庄稼没有以前做得大，进帐那样多，入了社又瞒不了产，还要卖余粮，也不能多打耙耙，走亲戚了，他们都是不大高兴的！”

在松林乡工作了一个多月，因为进城来开会，不久我又离开了那里。距现在已经八个月了，我一直没有得空回去。前几天在一个会议上，无意中又遇到了过去大同社的顾银山，他告诉我松林乡的变化和发展，大有一日千里之势，今年二月间他们十二个初级社早已经转成一个五百多户的高级社了，当惯了小家的人，居然当起大家来了；但是这几个月来，工作是非常紧张的，从积肥、修水利、撒秧、抗旱直到这次的丰收，他们进行了不计其数的，剧烈的战斗。他兴高采烈地叙述了他们的丰富的斗争经验以后，接着就问我道：

“你怎么老是不回去呢？还记得欠了我们一笔帐吗？”

我才想起了我曾经答应过他们，回来后写一篇《再访松林乡》，连忙陪笑道：“不久我就要回去了；老顾，你是不是向我要帐呢？”

“当然要帐啊！欠了帐不还能行吗？”

“我的文章写成太晚了，好些人看过，都说这个材料已经过时了；我看，不如等我将来再写一篇东西，来描写你们高级社的新面貌吧！”

顾银山摇头道：“不，那是以后的事情；同志，难道你把那次访问当作回忆来写，都不行吗？我们没有昨天，就不会有今天；要是不经过前两年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哪里会走